

## 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報告

王莉珍

此次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主題“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與我的博士課題——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傳統戲曲有相當的關聯性。帶著學習都市文化研究方法、開拓學術視野的願望，我欣然報名參加。非常感謝中研院史語所等主辦單位和不辭辛苦組織協調的老師們，使我有幸成為學員之一，有機會聆聽密集的精彩講演，進入歷史現場考察，並與師友們切磋砥礪。短短十天之內，學有所得，更能結識一些學術同路人。以下擇要談談豐富收穫之中相互關聯的三個方面：城市空間地理對於都市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田野考察與文獻研讀結合的治學方法；多面向多層次的文獻解讀。

胡阿祥教授的講演開宗明義、闡明南京“華夏正統之都”、“進取之都”的歷史特質，更從微觀角度述及南京都市空間的歷史變化及記憶符號；陳剛教授著眼地理信息化技術，介紹了南京歷史地理研究的新突破；大木康教授考證晚明秦淮一帶的空間地理，凸顯了文化區與舊院的緊密關係，由此探討晚明青樓與才子佳人文化。三位專家的講演都凸顯了歷史地理與都市空間與城市化、城市文化之間緊密互動的關係。費絲言教授在其專著《折衝城市空間：城市化與晚明南京》亦提出：歷史地影響晚期帝國都市空間的“城市化”實際上是文化和制度實踐的過程。<sup>1</sup> 歷史與空間、地理與文化的交互，在這座古代都城顯得尤為突出。

四天考察期間，就空間地理關係而言，明孝陵、中山陵、靈谷寺三處留下印象最深。根據文獻資料和實地踏查，三者的歷史地理關係大致如下：1) 明太祖為建孝陵，將開山寺遷至鐘山東南獨龍崗，更名為靈谷寺，因此現孝陵位於原蔣山寺的位置；<sup>2</sup> 2) 中山陵位於孝陵與靈谷寺之間的高地，在靈谷寺登靈谷塔可見中山陵的大屋頂結構，而不能見孝陵的方城明樓。孝陵與中山陵的異同是考察途中同行師友討論的重點。就形制規模、建築設計、功能意圖而言兩陵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然引發更多思考的卻是兩者相似之處及潛在聯繫。例如，兩陵整體佈局都是坐北朝南；謁陵都需經牌坊；中山陵墓道兩旁雖沒有石獸石人，亦有石獅與花池呈對稱分佈；陵墓建成之後，兩陵均有興盛的謁陵活動。另外，雖然中山陵主體建築採用的是石料，而非木料，在建築外形上卻保留了木結構建築特色。無論是整體還是細節上的比較，對於我理解兩陵背後的權力展示或政治意圖頗具啟

---

<sup>1</sup> Fei Si-yen.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13;239;247. 此處借用李孝悌教授《歷史與空間：簡論明清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些問題與趨向》一文中對費氏書名的翻譯，見《文匯報》2010年11月6日。

<sup>2</sup> 見《顧炎武謁孝陵詩選四-七十》註釋。研習營《考察參考資料》，頁83。

發性。此外，同行師友關於靈谷寺的歷史變遷及譚延闓墓結構佈局也有不少啟發性的討論。鐘山雖在南京城區東北，然歷來是皇家或國家權力的展示場域，因此也是承載南京歷史記憶的重要地理空間。無獨有偶，研習營結束之後，在上海蒐集論文資料、翻檢近代期刊間歇，我無意間發現一些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二月修建中山陵的實況照片。細讀這兩份文獻，發現當時人也關注兩陵的對比，兩篇報導分別題為《南京二陵》、《紀念孫總理》。<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篇報導照片下方有一行英文說明，讀作“**Note the contrast in modern and ancient architecture**”。此處關於兩陵風“現代/古代”截然區分的說明，提示我陵墓修建時代人們對於這件“物”的理解，跟我現今參觀的感受不盡相同。空間雖一，解讀殊異。田曉菲教授在關於顏延之宮廷詩的講演中強調的文本閱讀中的歷史主義，在實物“閱讀”中也十分關鍵。

在處理城市空間個案時，需要考慮的具體因素十分複雜。下面談談研習營期間文獻研讀的一個例子。我所在的第二小組，在討論當中特別關注了清陳作霖（1837-1920）《運瀆橋道小志》這篇文獻，<sup>4</sup> 從文本的題辭、運瀆橋道圖、文本體例、寫作意圖各個方面，探討運瀆附近的空間地理關係。結合《小志》文本，我們發現，運瀆橋道圖的信息帶有明顯的個人選擇性。我們該如何處理這樣的文獻？我們可以據此確定都市裡一個具體的地方，例如陳作霖的居所講堂大街嗎？細心的學友比對 2015 年《南京老城區圖》之後發現，陳作霖圖所示地名如今有部分保留，亦有不少變更。最為明顯的變更即陳圖中運瀆上“草橋-紅土橋-斗門橋”一線已經變為鼎新路。我在南京期間購得複製版 1910 年《南京全圖》，其上三橋清晰可見，可作同時期圖志的對讀材料。<sup>5</sup> 從運瀆三橋到“鼎新路”的變遷歷史，應當是非常有意思的課題。陳作霖《小志》不僅提供了晚清南京運瀆附近的空間地理信息，更蘊藏著豐富的文人世家交遊信息，例如陳作霖與甘元煥、甘熙堂兄弟之間的學術交流。考察特定的都市地理空間內特定群體的文化交流，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話題。受此啟發，我局部調整了關於上海都市圈戲曲界社群的研究設想，此為參加研習營直接而意外的收穫。

參加研習營最為感念的是師友之間自由的交流和結下的友誼。無論是在較為正式的小組討論和綜合討論時的交鋒，還是考察途中隨意的交談，都讓人印象深刻。考察途中向馬老師請教版畫及戲曲出版方面的知識與研究；在考察現場劉老師不厭其煩地解說傳統建築結構及常識性知識；“三人小組”不限時地愉快歡暢的討論；雅英熱情細心的關照；與室友相見恨晚，深夜暢聊《金瓶》《紅樓》。凡此種種，難以忘懷。

---

<sup>3</sup> 《良友》第三十一期，頁 27；第三十三期，頁 19。

<sup>4</sup> 研習營《課程指定資料》，頁 8-29。

<sup>5</sup> 按，陳作霖 1920 年去世，《運瀆橋道小志》為《金陵瑣志五種》之一，為其晚年之作。

自本科畢業離開南京十年，去國留學五年，回來第一站竟是玄武湖畔、紫金山麓。研習營期間，偶然途徑曾經求學多年的母校、流連忘返的戲院、逛過的書店和街區，每每有點心驚那變化逼人。在南京的都市空間裡，個人與歷史記憶相摻雜，遙遙呼喚着逝去的歲月：原來一個人靜靜看過戲的朝天宮是文獻中府學所在地；原來隨之習曲的甘老師家舊宅曾經定格在陳作霖所繪道橋小志圖裡。南京研習營，作為個人歷史的縮結點，彌足珍貴。